

003673



出版史志丛书

JCSZ

扬州卷

江苏艺文志



出版史志丛书

江苏艺文志

扬州卷·上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江蘇藝文志

顧廷龍題



《出版史志丛书》前言

从1989年10月起,我们为了编纂《江苏出版志》,开始征集、整理出版史料,先是点点滴滴,后来就涓涓成流了。其中有不少长篇的出版史料专辑,是专家、学者们经过长期辛勤劳动所积累而奉献出来的巨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虽说这些史料大部份属于江苏地方性的,也足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出版事业对于整个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关系极为紧密,影响极其深远。而现有史料之丰富,远非一部综合性的、受体例和篇幅限制的《江苏出版志》所能容纳的。如果把大量史料继续束诸高阁,弃之不传,那就太可惜了,我们这些出版史志工作者也会长久自愧不安的。

由此,我们引发出一个念头,就是在编纂《江苏出版志》的基础上,再编辑一套《出版史志丛书》,不仅可以把已征集来的专题史料传之于世,还可以继续从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发掘有关的珍品予以出版,这无疑将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事情。

但是,编辑出版这套史志丛书,不能不说又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它涉及的内容很广(包括编辑、印刷、发行、管理诸多方面);范围很大(从本省到区域直至全国);时间跨度很长(上溯至发端,下限于当今)。我们的初步打算是:实事求是,分步实施,细水长流。先从编纂江苏地区的出版史料做起,然后面向更大范围征集,逐步

开展,成熟一本,出版一本,积少成多。不仅如此,出版这套史志丛书,要有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这也是一大难题,要求各方面的协调才能解决。

令人振奋的是,这一出版工程,首先得到了江苏省出版总社蒋迪安等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关怀,他们从出版事业的长远利益出发,既在编辑思路上加以指引,又在人力和经费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江苏人民出版社也乐意接纳出版。同时社会各界有关专家、学者和我省出版界的前辈,都热情关注,积极参与了编纂工作。

经过五年多来的耕耘,除《江苏出版志》外,《出版史志丛书》的第一批选题已编纂成书,将陆续问世。它们是:

《江苏出版大事记》

《江苏出版人物》

《江苏出版机构》

《江苏刻书》

《江苏图书编辑史》

《江苏报刊编辑史》

《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

《民国党派社团出版活动史略》

《华中解放区出版事业简史》

《江苏革命出版活动纪事》

《江苏艺文志》(以市为卷)

这批丛书,总的来看,它的史料性、学术性、时代性,是相当鲜明的。其中大部份虽系地方性史料,由于江苏地区自古以来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伴随而产生、发展的出版事业,在全国也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它的实际价值,势必远远超过它的地方性。相信它将为当今深化出版改革、繁荣出版事业起一定的借鉴作用,为更深层次地进行出版科学研究创造一定的有利条件。果能如此,我们也就算尽到了一份责任。

回顾这批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我们深感它是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江苏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出版史志编辑部负责具体地策划和组织工作。南京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省博物院、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委党史工委、省政协文史办以及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许多单位及其专家学者都热情给予了配合和支持。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倪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赵国璋教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方庆秋研究馆员、出版家周天泽等分别担任各书的主编。江苏省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高斯、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高介子和全体编委、江苏省出版总社柯光勤、江树廉、朱文虎、朱兴乔等分别为丛书审读。丛书由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编审俞洪帆主编，省出版史志编辑部主任、副编审穆纬铭任副主编；王春南、邱禹、徐飞、钱兴奇等分别担任责任编辑。在丛书付梓之际，我们对所有为丛书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

江苏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部

1993年9月20日

扬州卷

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
《江苏艺文志》编纂委员会

主 编 赵国璋
副主编 江庆柏
编 委 赵国璋 江庆柏 汤大民 韩 石 谢秉洪

《江苏艺文志·扬州卷》编写组名单

主 编 封桂荣
副主编 刘立人 薛瑞庭 陈仁芳
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
江庆柏 汤大民 杨鲁江 李 洁 陈 妹 陈仁芳
陈丽萍 赵国璋 韩 石 薛瑞庭

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
《江苏艺文志》编纂委员会

主 编 赵国璋
副主编 江庆柏
编 委 赵国璋 江庆柏 汤大民 韩 石 谢秉洪

《江苏艺文志·扬州卷》编写组名单

主 编 封桂荣
副主编 刘立人 薛瑞庭 陈仁芳
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
江庆柏 汤大民 杨鲁江 李 洁 陈 妹 陈仁芳
陈丽萍 赵国璋 韩 石 薛瑞庭

前 言

赵国璋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 and 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要继承并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必须广泛深入地开发文化资源,编制各种典籍目录实为当务之急。我国又是目录学起源很早的国家,公元前一世纪,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天下遗书,先后撰成《别录》和《七略》,奠定了我国目录学的基础。东汉班固节录《七略》撰成《汉书艺文志》,开创了我国史志书目的先例。以后历代各有制作,形成系列化的具有独创性的我国目录学优良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典籍的日益丰富,目录技术的不断进步,目录学著作的种类与数量都迅猛增长。

建国以来,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作为文化信息载体的目录著作,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如《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等连续出版物相继问世,及时提供了全国范围的图书出版信息,并且为今后的文献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些大型的综合书目、书题目,如《十史艺文经籍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四部总录》等陆续出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检索工具。

但是,现有的成绩仍是不够的。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化遗产极为丰富,目录学上有待开发的领域十分广阔,地方著作目录就是其中之一。

地方著作目录习惯上叫作地方艺文志。我们这里指的是地方

人士(包括一部分侨居或寓居者)的著作目录。地方艺文志,按其性质来说,应是史志书目的分支,大致又可分为省志和府县志两级。由于地方艺文志取材的地域小,更接近于著录对象,就具有“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章学诚《修志十议》)的优势。地方艺文志不仅对研究地方文献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充实完善史志书目也有积极意义。

地方艺文志性质上虽属于史志书目的分支,但是却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起源较迟。据唐刘知几《史通·书志篇》记载,北齐、北周间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中的《坟籍志》,著录了当时邺下文士的著作,这大概是最早的地方艺文志。同第一部史志书目《汉书艺文志》相比,约晚了500年。此后又经历了600余年才有了南宋高似孙的《郑录》(今浙江嵊县地方志),其第5卷、第6卷著录了当地文人的著作,并辑录了有关当地的诗文。这是现存最早的地方艺文志。地方艺文志的大量出现已经是明、清两代的事了。二、内容不纯。地方艺文志顾名思义,当以收录本地人著作目录为限,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前述《郑录》即既收目录,又录诗文。流风所及,诚如姚名达所说:“明清志家,多抄诗文而少于目录。”(《中国目录学史》第386页)所收内容尚不止此,姚氏举出乾隆《归德府志·艺文略》竟列出四子目:学宫经籍,名家著述,金石文字,郡县志乘。这是对地方艺文志内容的最广泛的理解。还要补充说明的是,经常有人把著录本地人著作的地方艺文志和辑录有关某地的地方文献书目并为一类,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就包含这两部分内容,他把前者称为内编,后者称为外编。其实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书目,我们认为分开编写为宜。三、类别不明。地方艺文志是记载一定行政区域内著作之总目,行政区域是一定历史时期国家为进行分级管理而划分的区域。如果说史志书目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全国总书目(又有通载与断代之分),地方艺文志无

疑是相当于这一总书目的地方分卷。容肇祖在1928年发表的《目录学家著述之分途》一文中已把《地方目录及地方志之目录》作为“史家目录”的一个分支,可惜这一正确分类似乎未被广泛采用。四、新修地方志不列“艺文志”这一类目。建国以后,60年代、80年代两次掀起新修地方志的高潮。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大事,规模宏大,意义深远。新志中门类齐全,而独无“艺文志”。我们认为这并不足怪,因为“艺文志”是专业性较强的部分,独立出来作为专志之一,比收入地方志中更加适宜。

我国幅员辽阔,历代文献浩如烟海。为了全面地查清这一文化资源,包括已佚的和现存的,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通力合作,统一体例,各自编好本地区的艺文志。我国已故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钱亚新先生,生前得知我们这一想法时,非常赞赏,说:“这样我们就有了一部翔实可信的《中华艺文志》了!”是的,这下是我们的最大愿望。一部《中华艺文志》,与先进的电子技术相结合,就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华民族著作的信息库,其意义该是何等重大!

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当然不是少数人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了促使这一宏伟目标能早日实现,我们不顾力量有限,提出了《江苏艺文志》这一课题,愿意为这一巨大工程添砖加瓦,铺路架桥。

关于“江苏艺文志”,前人已编写过以下几种:(1)乾隆《江南通志》中的《艺文志》,共5卷,收书数千种,依四部分类,著录书名卷数作者,间有作者简介或按语。(2)清末常熟人潘任编著《江苏艺文志》,存经部稿本14册,著录简略,藏南京图书馆。这是清末宣统年间缪荃孙主编的《江苏通志稿》的一部分。(3)金强撰《江苏艺文志》,是1929年前后纂修的《江苏通志稿》的一部分,全书未完。其《经部》发表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第6、7、8期(1933—

1935);《史部》稿本全19册,藏南京图书馆。此书著录极详,其版本项列举收藏该书之各馆藏书目录,近似联合书目的体制,用意甚善,可惜未竟全功。(4)1945年汪伪时期以吴廷燮为总纂所编《江苏通志稿》,其中亦有《艺文志》,按当时府县政区分为17卷,著录简略而且草率,似为未定稿。这部《通志稿》正在整理中,今后可望出版。

我们这次重新编写《江苏艺文志》,其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求全。凡本省籍人士著、编、注、评、校勘、增补、翻译,以及重要的校刻之书,不论存佚,均加收录。我们认为著作与整理都是文献工作,艺文志应当一视同仁,予以著录。二是求实。材料务必信而有微,表述力求繁简适当,查阅便利,一以向读者负责为宗旨。在编写体制和体例方面有以下五点须加说明:

一、本书为多卷集。以1990年本省行政区划为分卷标准,以每一省辖市及其属县(含县级市)为1卷,全书共分11卷。每卷内市及直属县作为一个单元,其余属县仍各自作为独立单元。这样的体制使本书可分可合,分之可成为市、县艺文志,合之则为全省艺文志。

二、时间断限。本书收上古至清末(1911年)本省籍及定居本省的人士的全部著作。生于晚清活动在民国期间的学人,其著作基本上属于传统文化经、史、子、集范畴者(或谓之“旧学书”)则酌收。这一弹性断限是为了保持传统文化相对的完整性,又不致过多地打乱清末与民国之间的时代界限。

三、全书结构。本书采用“以年系人,以人系书”的编写方法,不同于以著作分类为序的习见的编写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人与书紧密结合,便于“知人论书,因书知人”相互印证,避免了分类排列、人书脱离或人的介绍失之过简的缺点。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不便于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章学诚《校雠通义·互著》),我们

补救的方法是：一是每书之下标注类目，二是全书完成之后拟另编《书名分类索引》。

四、关于存佚。大量典籍遭受历代天灾人祸而散佚损毁，古人谓之“书厄”，这是令人痛心的事。《隋书·经籍志》兼记亡书，为后世树立了良好榜样；宋郑樵《校雠略》特著《编次必记亡书论》等篇以阐述其意义；清朱彝尊《经义考》于书名下分别注明存、佚、阙、未见四类，为后来多数书目所遵循。本书简化为三：存、佚、未详（不写）。因资料不足，有些书存佚难定，不得已只好空着此项留待以后填补。

五、关于零星篇章。本书以著录独立成书的著作为主。但有些人以单篇名作流传人间，有些人集子已佚而总集或其他书籍中保留其若干篇章。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本书亦间加著录或在按语中道及。

我们十分感谢江苏省出版总社领导和江苏省出版史志编辑部的同志，他们在目前“出书难”的情况下慷慨接受了本书的出版，并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的审读编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要出版这样一部巨著是十分困难的。我们也感谢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江苏省教委、南京图书馆以及各地各单位的编写者，没有他们的关怀、资助、撰稿、协作，我们是不可能顺利完成这部著作的。

我们的专业水平不够，见闻有限，再加上人力不足，时间紧迫，书中难免有不少缺点错误。诚恳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91年10月

凡 例

1. 本书著录上古至清末及部分生于晚清而于1949年9月30日之前去世的江苏籍作者著作,酌收外省流寓并定居于江苏的作者著作。

2. 本书以江苏省1990年行政区划分卷,每一省辖市及属县(含县级市)各自成卷,共11卷。古代行政区划归入现今相应的地区。已划归他省市者(如上海松江)不收,原无建制者(如张家港市)亦不单独列出。

3. 本书采用以年系人、以人系书的编纂方法,每一条目包括人物小传与所著书目两部分。人物以生活年代为序,生平不详者,附于大致相应的年代后面。

4. 所收书目以编集成册的古典文献为主,酌收零散作品。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及现代文学作品,一般不列入。

5. 著录各书依经、史、子、集、丛书的次序排列。书名下注明卷数、四部类目、存佚。现存书注明版本,稿本、抄本、稀见本等注明收藏单位。佚书注明出处。

6. 丛书子目在10种以下者全部列出,10种以上且《中国丛书综录》已收者注明“子目从略”。如不见于“综录”,则子目均一一列出,以备查检。

7. 各卷末附人名索引。全书各分卷出齐后,再另编全书的人名总索引和书名分类索引。

《扬州卷》引言

汤大民

扬州是我国著名的商业都市和文化古城。从公元前 486 年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算起,已有 2480 年的建城史。在汉代,称广陵、江都,隋唐以来称扬州。现为省辖市,下辖江都、邗江、仪征、高邮、兴化、宝应、泰州、泰县、泰兴、靖江 10 个县(市)。这部《江苏艺文志·扬州卷》,按现划扬州行政区域,编纂了从远古至 1949 年扬州籍和长期流寓、定居扬州地区的学者文人小传及其著述概况,为深入继承和发扬扬州传统文化提供了系统的、全方位的、迄今最完备的文献引得和信息储存。

翻检本卷,人们不难发现,作为区域文化,扬州的文化景观在江苏及我国古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吴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接、撞击和融合。既具有我国封建文化固有的基本格局,又具有因商业繁荣、交通发达等历史条件带来的独特气象。随着历史的推移,扬州文化的典籍日趋丰富,它的发展也日趋成熟和繁荣,因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建设也越来越显示出参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了其独特的优势和影响力。当然,扬州文化的发展轨迹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时起时伏地波浪式推进的。

扬州文化初荣于西汉初年及“文景之治”时代。当时,江苏这块孕育、诞生了汉王朝的大地上,经济、文化正在全面复苏。建藩广陵的吴王刘濞,正在展开他富国强兵、觊觎天下的雄图大略。广陵“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轂,人驾肩,廛闹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

铜山，才力雄富，士马精研”（鲍照《芜城赋》）。在这种背景下，扬州的审美文化率先兴起。“吴、蔡、齐、秦之声”响彻扬子江畔，四方茂材纷至沓来，文学家枚乘、邹阳、严忌之徒的华丽辞章，传遍全国。枚乘《七发》中关于广陵曲江观潮的描写，其华采文辞、丰富想像实得助于扬州壮丽风光。到了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来任江都王相五年，他以《春秋》及阴阳学说治理政务，把“天人合一”的思想痕迹深深地烙印在扬州的土地上。终两汉之世，扬州文化处于吸收、发育的过程之中。直到汉魏之际，广陵人陈琳以讨曹檄文及《饮马长城窟行》等乐府名篇，展现了扬州文化的清峻风骨和勃发生机，跻身于“建安七子”之列，饮誉中国文坛。

南朝宋武帝大明年间，广陵城毁于统治者内战烽火，经济、文化元气大丧。但处于发育期的扬州文化，生命力极其旺盛。到了隋唐时代，出现了烟花三月的灿烂春光。大运河的开凿，隋炀帝三下扬州，推动了扬州经济的复兴和南北文化的交流。当中国封建社会如中天丽日进入皇唐，扬州工商业及文化事业也同步迅猛发展。当时有“扬一益二”之说，扬州已成为全国首富之区，并作为东南沿海的商业大市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与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并列为四大口岸。鉴真和尚东渡日本，西方及中亚商人沿海上丝绸之路来扬，中外交流极一时之盛。

“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唐代扬州成为文人骚客荟萃渊薮。其时有数十位著名诗人到过扬州。李白、白居易、刘禹锡、孟浩然、张祜、杜牧、李绅、韦庄都在扬州留下了胜踪遗迹。他们诗文唱答，歌酒留连，从扬州这块肥美的大地上汲取诗情画意，又用灵感睿智把这块土地打扮得繁华似锦，更外妖娆。

如果说，初荣时期，扬州文化是由外地来游的文人唱了主角，而在隋唐，在继续荟萃全国精英同时，扬州本土俊彦也大踏步走向全国。唐初扬州张若虚，青年时代就以诗显名于东南，为“吴中四